哲 学 研 究

为道屡迁,唯变所适
——百年中国哲学的回顾

张 立 文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中国哲学史从谢无量、胡适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大纲》以来,已经百年。百年来经历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和自己讲、讲自己。从 20 世纪初到 30 年代初,是“在中国的哲学史”,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即就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问中,可与西洋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但他们有开中国哲学与哲学史风气之先的贡献。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怀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悲愿,以接着宋明理学中的朱熹理体学和王阳明心体学讲,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背叛其先贤朱子学家和阳明学家的根本精神和伦理道德规范,向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投出了犀利的一枪。从 40 年代到“文革”,在学苏联的过程中,将中国哲学套上了唯心与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帽子,并陷入“儒法论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哲学迎来了自己讲、讲自己的春天,中国的哲学才能自己讲自己中国哲学的故事,讲自己中国的哲学在世界哲学之林中独特的地位、作用和贡献,讲自己对人类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生态、社会人文、人际道德、心灵精神、文明价值之间的冲突与危机,构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化解之道的和合学理论思维学说,为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基。

关键词:照着讲;按着讲;对着讲;自己讲;和合学
中图分类号:B 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9)02-0051-11

沧海桑田,河清海晏。虽世事多变,但总归天下升平。百年来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怀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激情,担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使命。在百年与四十年的历史震荡中、流变中,中国哲学为变所适地硕果屡现。它们的负载者诞生了诸多中国哲学大家。他们既礼敬中国传统文化,精心挖掘哲学思想的所谓哲学思想的哲学思想,又以西方的哲学思想的哲学思想批判中国哲学思想贫乏。在此两难的紧张中,艰难地开启了中国哲学史历程,大体体现为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自己讲等阶段。

一、照着讲

最早以《中国哲学史》称谓的专著,是 1916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接着是 1919 年 2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此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不断呈现。中国有抑或没有中国哲学?金岳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二》中说:“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①“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史就是在中国的哲学史。”②其

收稿日期:2019-01-05
作者简介:张立文,男,浙江温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 2019 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基金”支持。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61 年版。金岳霖《审查报告》第 5 页。此书系用商务印书馆旧版重印。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 6 页。

意是说,中国哲学不是原生型的,而是传输型的,即中国原没有哲学,没有哲学史,为哲学在中国,而不是中国的中国哲学史。

既然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在中国,那么中国哲学史只能照着西方讲。蔡元培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中说:“中国古代学术从来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记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①只能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言下之意,就是照着西洋人的哲学史讲。所以金岳霖说:“我们看那本书(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②因为照着西方哲学史讲,故像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写的,是美国人的“成见”。金岳霖认为:“哲学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成见,哲学一定要有所见。”其所谓“成见”,可理解为一种道理或者观点。

但在中国近代风云变幻中,由于中国落后而遭受列强帝国的侵略,割地赔款,惨遭掠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为救亡图存,而向西方学习,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输入西方的器物技术、制度和价值观。在这种情境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有开中国哲学风气之先的重要价值。

之所以说具有开中国哲学风气之先,是因为企图在新的世界形势下,把中国哲学转向现代化,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学科相接轨。在中国古人的著作中没有可依傍的情境下,唯有依傍西方的哲学史,这是时代的所需。故而被人认为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蔡元培在胡适该书的“序”中认为,有四大特长:第一是证明的方法。要考时代,知思想的来源;辨真伪,揭实在的主义;用方法,见矛盾的议论,为后来学者开研究之法门。第二是扼要的手段。讲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不是哲学思想发达史,所以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对老子以后的诸子,以平等态度指出各自长短,还本来面目。第四是系统的研究。用发展的观点,研究哲学流派来龙去脉。

之所以说其有开中国在哲学风气之先,是因为度越了以往哲学史基本上为旧哲学史家范围。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说:“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学生问他,照这样讲下去,什么时候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③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从唐尧、虞舜讲起,讲儒家古史传说中的伏羲画卦及神农以至黄帝尧舜,继兴伦理政治之事,作为中国哲学之渊源,构成“儒家之秘要,哲学之统宗”。并以“史传之体裁,兼流略之义旨”。④ 以儒家为中国哲学正宗,基本未度越传统儒家古史观的范围。他说:“儒即哲学,伎即科学。官学失散,乃谓之儒学,谓之道学,谓之理学,佛氏谓之义学,西方谓哲学,其实一也。”⑤如果说谢无量此书出版于五四之前,情有可原,那么,钟泰的《中国哲学史》则出版于 1929 年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他在之江大学教中国哲学史,该书无《绪论》。但在《凡例》中标示其趣旨:“此书以史传之体裁,述流略之旨趣,故上下则详其源流,彼是亦辨同异。”“史家之例,或以事为题,或以人为目。”“史家纪传,有合有分,或以附从,或以连及。”⑥基本属中国传统儒家古

---

① 蔡元培:《中国哲学史大纲·序》,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9 年版,第 1 页。

② 金岳霖:《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二》,北京: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6 页。

③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200 页。冯先生所说的那位教授是指陈黼宸,他主张:“儒学者,乃哲学之轨也。”

④ 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上海:中华书局 1916 年版,绪论第 1 页。

⑤ 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上海:绪论第 1 页。

⑥ 钟泰:《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9 年版,凡例第 1 页。

史观的范围。尽管如此,其书可贵之处,是开中国哲学讲概念、范畴之先。如讲“上古之思想”,讲本天、尽人、首孝、用中、上民、大天下;讲老子思想,讲道、无为、三宝、婴儿;孔子思想,讲仁、忠恕、孝弟、五伦、成己成物、富教、小康、大同、知命之学;墨子思想,讲兼爱、非攻、节用、天志、墨经;董仲舒思想,讲天人合一说、性、仁义;朱子思想,讲理气、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居敬穷理;陆象山思想,讲立大、辨志。其书虽讲概念、范畴,但不明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且有的思想家亦无开列概念,笼而统之,整体上说缺逻辑系统。钟泰认为,“中西学术,各有系统,强为比附,转失本真”。① 不太认同作中西学术的比较与会通。他们正如蔡元培所说:“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故不能够成系统的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认为,蔡元培在胡适那本书中,讲其特长为扼要手段,这于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胡适是照着杜威的实用主义,或称实验主义讲。按金岳霖的说法,“冯先生的态度也是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他的“思想倾向于实在主义”。② 因而他与胡适一样,照着新实在论的思想讲。冯先生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③“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④中国哲学、哲学家一依西洋之所谓哲学或西洋的哲学家。既要把整体的中国哲学打碎、打乱,从中挑出合乎西洋所谓哲学的学问而叙述;中国哲学家选出某种学者,可以西洋哲学家称之的。这样毫无疑问,中国哲学、哲学家都成为西洋哲学、哲学家附庸,一切照着西洋讲,没有自己讲的余地,哲学家只能是西洋哲学家的奴才,只有“喳”的名分。

尽管谢无量、钟泰和胡适、冯友兰其对哲学观点的理解、研究方法、思想旨趣、论述主旨,均有差分,但没有展开交流、论争。即使那位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的教授,“拿着胡适的一份讲义,在我们的课堂上,笑不可抑。他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⑤但没有学术意义上的论争。随着五四运动“新思想”影响的深入和传播,谢无量、钟泰古史派的影响被边缘化,至于被遗忘了。

二、接着讲

五四运动前后,在西潮思想激烈冲撞中,中国传统文化在一片批判、痛斥、打倒、决裂声中,逐渐退出了在学术思想中统治地位。尽管一些进步青年热衷于向西方学习,但未到脱中入西,脱华入“夷”的程度。学术思想界很多人仍然坚持接续中华传统文脉,发扬中华传统精神。“九一八”事变爆发,“脱亚入欧”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中国的东北三省,全国愤怒。随着日本军国主义逐渐吞噬中国领土,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便与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思想方式发生严重冲突,整个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怀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悲愿,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救国救民的责任意识,或直接参与抗日武装斗争,或为弘扬中华文化抗衡日本文化侵略,或为中国之命运而积极寻求出路,或为建设新政治、新文化而探赜索隐,振兴中华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主体得以坚挺。

为反抗日本军国主义残暴无人道的政治、军事、文化的野蛮的侵略行径,中国人民和爱国志士

① 钟泰:《中国哲学史》,上海:凡例第 1 页。

② 金岳霖:《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二》,北京,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7 页。

③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绪论》,北京,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1 页。

④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绪论》,第 8 页。

⑤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绪论》,第 200 页。

及知识分子奋起抗日,梁漱溟奔走各地及军政要人之间,积极推动抗日。① 熊十力于 1938 年春避寇入川,悲愤交加,遂给学生讲民族精神、种原及通史,确信吾国家、民族、文化决不会亡! 熊十力说:“吾有一坚确信念,日本人决不能亡我国家,决不能亡我民族”。② “我国人向来爱和平,贵礼让,不肯使用凶蛮手段。无阶级于内,无抢夺于外,就因为他常有维持最高文化团体的观念。这便是他的国家观念。由中国人这种观念扩充出去,人类都依着至诚、至信、至公、至善的方向去努力,可使全世界成一个最高的文化团体。”③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贵礼让,道德高尚的民族,如果世界都依着诚、信、公、善去实施,世界就成为最高的文化团体,这是熊十力的天下观。基于这样天下观,他斥责列强不悟,做强盗、抢夺、残杀的事情而不悟。“我们的东邻(按指日本),首先以此对待我们的国族。我们今日要维持民族的生命,为宇宙真理计,为全人类谋幸福计,我们都得要保全我固有的高尚文化。我们不得不牺牲,与强盗战,与凶猘战,与抢夺残杀我者,坚决力战”。④ 其维持中华民族生命,要与恶魔力战到底的精神,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一方面以武器的力战,反抗武器的侵略强盗,无论在正面战场抑或敌后战场,展开艰苦卓绝的殊死力战;另方面以文化思想武器批判文化侵略的凶猘。日本本无文字思想,是儒学滋养其成长,在朱熹思想和王阳明思想传入日本后,朱子学和阳明学被普遍受容,并一度成为占主导的意识形态。形成以藤原惺窝和林罗山为代表的京师朱子学派,以安东省庵、贝原益轩等为代表的海西朱子学派、以山崎暗斋、三宅尚斋等为代表的海南朱子学派,以中井竹山、中井履轩等为代表的大阪朱子学派。宽政以后朱子学派以柴野栗山等为代表,水户学派以德川光国、藤田东湖为代表。朱子学不仅成为德川幕府的官学,而且渗透到社会各阶段,并要求通俗化、普及化和易简化,因而阳明思想受到重视。五山时代的桂悟(号了庵,1424—1514)在宁波广利寺时曾与王阳明相遇,当桂悟回日本时,王阳明曾作《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并将阳明的著作带回日本。曾为武士的中江滕树开创日本阳明学派,他认为“心学为由凡夫至圣人之道”。其后有渊冈山、梁川星岩、春日潜庵等重内省的德教派与熊泽蕃山、大盐中斋、吉田松阴等重实践的事功派,为明治维新作了思想准备⑤。

朱子学与阳明学本属中国宋明理学中的理体学派与心体学派,传到日本成为其主导意识形态的官学和有重大影响的理论思维形态。当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大地疯狂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之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思想家、哲学家反抗日本文化侵略,便击中日本文化思想的要害,投出智慧卓越的一枪,接着宋明理学中朱熹理体学讲和阳明心体学讲,以揭出其违背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基本思想和根本精神,批判其叛逆其先贤所遵循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基本道义和根本礼仪。冯友兰在《新事论·序》中说:“自中日战起,随学校南来,在南岳写成《新理学》一书,此书序中有云:‘此书虽不着实际,而当前有许多实际问题,其解决与此书所论,不无关系’。此书成后,事变益亟,因另写一书,以讨论当前许多实际问题,名曰《新事论》。”⑥冯先生之所以“接着讲”,是因为“对当世之巨变,中心感发,不能自己”⑦而讲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因

① 参见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中《我所了解的蒋介石》《七七事变后的韩复榘》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5—145 页。

② 熊十力:《中国历史讲话》,《熊十力全集》第 2 卷,《编者后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59 页。

③ 熊十力:《中国历史讲话》,《熊十力全集》第 2 卷,第 648 页。

④ 熊十力:《中国历史讲话》,《熊十力全集》第 2 卷,第 648 页。

⑤ 参见朱谦之:《日本朱子学》,北京:三联书店 1958 年版,《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⑥ 冯友兰:《新事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0 年版,自序第 1 页。

⑦ 冯友兰:《新理学》,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自序第 1 页。

此我们自号我们的系统为新理学”①。接着宋明理学讲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是指程颐和朱熹的理学,即朱子学,接着讲是依据冯先生所处时代的冲突与危机而讲的,而非朱熹所处的时代,故与“照着讲”有别。冯先生指出:“依照其社会之理所规定之基本规律者,所以是道德底。但其社会所作之盗贼底行为,对于其所属于之较高底社会说,则是违反其所依照之理所规定之基本规律,所以是不道德底。又如在一国之内,杀人为最大底不道德。”②意指日本军国主义杀人,是盗贼的行为,是最不道德的,此与熊十力谴责日本侵略是强盗同工。在《新事论》中,冯先生驳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是日本进步快,是经济合作、是军阀的意思,财阀是不赞成的,以及认为中国尚未进步到一个能与日本打仗的地步,不如暂时不打等等错误的论调和投降主义不抵抗的思想。冯先生指出:日本的侵略,我们必须抗战,“我们常说我们这次抗战,有革命的性质,这些话也是一种事实的反映”③。在抗日战争颠沛流离的将近十年中,冯友兰写了六部书④。“民族的兴亡与历史的变化,倒是给我许多启示和激发。没有这些启示和激发,书是写不出来的”⑤。是挽民族危亡的激发而作,是愿“将要造成一个新中国,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有无过不及。这是我们深信,而没有丝毫怀疑底”⑥而作,要建设新中国,是中华民族的愿望。

冯友兰以接着朱熹理学讲,向日本文化侵略投出有力的一枪,熊十力等以接着宋明理学中王阳明心学讲,亦向日本文化侵略投出锐利的一枪。他在 1944 年《新唯识论全部印行记》中说:“余有嘉州之行,适遇寇机,频年积稿尽毁,友好多伤之。”由于日本飞机轰炸,累年积稿(手稿)尽毁,1938 年避日寇侵略到重庆,“余孤羁穷乡破寺中,老来颠沛,加复贫困,乃强自援笔,续 《功能章》上下,以三十年孟秋脱稿,辑为中卷。”⑦即《新唯识论(话体文本)》中卷。全书三卷,于 1944 年 3 月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贺麟说:“新文化运动以来,倡道陆王之学最有力量的人,当然要推梁漱溟先生。”熊十力“自造《新唯识论》,对陆(九渊)王(阳明)本心之学,发挥为绝对待的本体,且本翕辟之说,而发展设施为宇宙论,用性智实证以发挥陆之反省本心,王之致良知”⑧。熊十力在解释其唯识说:“识者,心之异名。唯者,显其殊特。即万化之原而名以本心,是最殊特。”⑨他认为老当国难,精力日衰,平生心事,寄之此书。因此,他对此书,十分重视。他在《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开章《明宗》说:“今造此论,为欲悟诸究玄学者,令知一切物的本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在相应故。”⑩本体即自心,不是在外的境。心是吾与万物所共同的实体。自心、本心作为万化实体,在万化中所针对不同环境的语境、存在状态、流行所由,主身秩理、涵备万德等情境,而有天、命、道、性、心、理、仁、知、明德九名,于是本心、自心便可包罗万象、统摄天地万物宇宙、社会人事活动、伦理道德规范、人性心理状态等,而构成既度越宇宙、社会、人生的形而上者,又存在于宇宙、社会、人生之中的制约者。正如贺麟所说,熊十力的哲学为陆王心学之精微化、系统化最独创之集大成者⑪。批判了日本文化侵略背离了阳明学根本精神和伦理道德规范。他作

① 冯友兰:《新理学》,绪论第 1 页。
② 冯友兰:《新理学》,第 174 页。
③ 冯友兰:《新事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0 年版,第 205 页。
④ 六书为《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为贞元之际六书。
⑤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245 页。
⑥ 冯友兰:《新事论》,第 230 页。
⑦ 《初印上中卷序言》,《熊十力全集》第 3 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 页。
⑧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 1947 年版,第 13 页。
⑨ 《新唯识论全部印行记》,《熊十力全集》第 3 卷,第 3 页。
⑩ 《熊十力全集》第 3 卷,第 13 页。
⑪ 《当代中国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 1947 年版,第 13 页。

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中国哲学家,既有上求致广大宇宙本体的体悟,又有下索尽精微社会人生的自觉,以及其忧国忧民、救民族于艰难困苦的悲愿,造就他独树一帜的觉解,敢批敢立的人格。

马一浮曾主讲复性书院,他本是隐居西子湖畔的高士。贺麟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其格物穷理,解释经典,讲学立教,一本程朱,而其返本心性,祛习复性,则接近陆王之守约。”①在日寇侵略中国时,他被迫结束西子湖畔高士生活,随浙江大学师生流离转徙。他悲“吾国家民族被夷狄侵凌到此地步,吾侪身受痛苦,心怵危亡,当思匹夫有责,将何以振此垂绝之绪,成此恢复之业,拯此不拔之苦”②。他以拯救民族危亡的忧患意识,匹夫有责的使命精神,振兴中华民族垂绝道统,必须有统全的、强大的文化实力,以发扬“六艺”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以抗衡外来的各种侵略,今中国遭日寇侵凌,要“力战不屈,理之至也”。他与诸生讲国学,接着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教讲。之所以讲此四句教,是“教诸生立志,特为拈出,希望竖起脊梁,猛著精采,依此立志,方能堂堂地做一个人,须知人人有此责任,人人具此力量,切莫自己诿却,自己菲薄。此便是‘仁以为己任’的榜样,亦即是今日讲学的宗旨”③在此民族危亡之际,决不能妄自菲薄,要竖起脊梁,挺起胸膛,树立信心,负起责任,济世蹇难,开太平之世。

马一浮、熊十力、冯友兰等一批知识分子在敌寇侵凌的特殊境遇中讲国学、新唯识论、新理学、讲“六艺”、讲“四句教”等。他们在中华文明遭受屈辱、亡国亡种的精神惨苦的颠沛流离逃难中,在敌机不断轰炸下,他们毅然决然继承、弘扬、创新儒学的朱子学、阳明学以及各学派的思想,构建中华文明的主体精神价值和反抗、批判文化侵略的自觉意识,重新树立民族的主体价值信念和终极关切,因而,在抗战境遇下的“接着讲”,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三、对着讲

中国谚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抗战胜利,日本投降。贺麟在 1947 年由胜利出版公司出版了《当代中国哲学》。他说:“辩证法唯物论盛行于‘九一八’前居十年左右,当时有希望的青年,几乎都受此思潮的影响……于是从日本传译过来的辩证法唯物论的书籍遂充斥坊间,占据着一般青年的思想了。”④他认为当时青年情志上需要一个信仰,以为精神的归宿,行为的指针,辩证法唯物论便恰好提供了一个主义的信仰。辩证法唯物论以物质在于意识之先,先有物质,后有心灵,乃是科学常识。物质决定意识,身体决定心灵;辩证法原是哲学中的一个主要思想方法,为哲学家所共有,而非任何一派所能包办;其历史哲学是唯物史观,是注重社会背景的一种历史观,是下层决定上层,是人类的阶级斗争史。在辩证法唯物论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李石岑的《中国哲学十讲》、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等以唯心与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着讲。

李石岑的《中国哲学十讲》是据 1932 年福建教育厅暑期讲学会的讲稿整理而成,1935 年世界书局出版。他在《绪论》中认为应以什么是物质来决定哲学的性质,中国有辩证法,也有仅少的唯物论,儒家既以拥护封建组织为职责,当然不提出它的十足的唯心论。中国的哲学现在将要开始走辩证法的唯物论的步式。范寿康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于 1936 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中国哲学史通论》。他认为“所谓生产诸力及生产诸关系可以说是两种最根本、最一般的对立物,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社会的发展看作两种对立物的斗争的历程时,方才对于社会的发展能够彻底理解”⑤。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出发,认为社会意识

① 《当代中国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 1947 年版,第 16 页。
② 马一浮:《宜山会语·说忠信笃敬》,《马一浮集》第 1 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4 页。
③ 《泰和会语·横渠四句教》,《马一浮集》第 1 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 页。
④ 《当代中国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 1947 年版,第 72 页。
⑤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北京:三联书店 1983 年重印本,绪论第 7 页。

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是他新观点的根本要义。“这种社会意识(即哲学的、宗教的、艺术的以及政治的各种理论)所构成的所谓观念的上层结构(就是通常所谓观念形态或意识形态),也是随着经济基础结构的变动而变动的”①。他又从上层结构与经济基础结构的分析中,认为“唯心论者认为意识可以支配存在,而唯物论者却以为存在对于意识是独立的,正如地球在那儿转,我们对之不能支配一样,整个的社会的变化也不是人们的思想所能任意支配的”②。因而,他批评了唯心论的观念论、运命论。他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结构均为对立物,即对着讲。正如其自己所说“观点却与当时各家不同,主以唯物辩证法阐述我国历代各家之思想”③。例如他对陆九渊思想评价说:“有心的存在,然后有物的存在,只有心才是唯一的实在,所以他有‘心即理’的主张。他是一个彻底的唯心论者。”④他对王阳明哲学认为,“阳明继承陆象山的心即理的思想,建立他的绝对唯心论。”⑤以心即理说、知行合一说及致良知说系阳明学说的三大纲领,以心为本体的唯心论。他认为王夫之“深恶王守仁之说,因之对于陆九渊亦竭力攻击……夫之治学,排除迷信,注重实证,饶有科学的精神”⑥,而于横渠的《正蒙》尤表崇仰,意为唯物论者。李石岑与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基本上是将唯心论与唯物论对着讲的。

接着李、范唯物、唯心对着讲是学习苏联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向苏联“一边倒”地学习中,完全遵循苏联《联共(布)党史教程》中四章二节关于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定讲。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根据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所有的哲学派别分成两大阵营——唯物主义阵营和唯心主义阵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进步的唯物主义路线在这一斗争中的形成和发展,是哲学在许多世纪以来全部发展的规律。在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社会的进步阶级反对反动阶级的斗争。”⑦哲学史被规定为:“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⑧根据这些定义。1957 年 1 月在北京大学临湖轩召开全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会。当时全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均参加了,并提供了论文。会议总结得出这样的结论:唯物主义——代表进步阶级——辩证法;唯心主义——代表反动阶级——形而上学的三段式⑨。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进步阶级与反动阶级为对立的两大阵营。根据此规定,在“反右派”斗争后,在 1961 年开始撰写各学科的教科书。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教员集中在中共中央党校编写《中国哲学史》⑩,将中国各个时期哲学放置在两个阵营的斗争中,对每个哲学家都首先作阶级的分析,即代表那个阶级的利益,其次则分析其哲学属于那个阵营,对哲学家的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作唯物唯心的分析。譬如讲老子的唯物主义辩

①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绪论第 20 页。
②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绪论第 18 页。
③ 范寿康《三联重版〈中国哲学史通论〉》,序第 1 页。
④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第 365 页。
⑤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第 371 页。
⑥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北京:三联书店 1983 年重印本,第 415—416 页。
⑦ 罗森塔尔·尤金编:《简明哲学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73—374 页。
⑧ 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4 页。
⑨ 参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10—518 页。
⑩ 1960 年毕业的助教,北京大学的楼宇烈、庄印,中国人民大学的张立文、王俊义,做一些辅助工作,不过每次讨论,我们都参加,受益匪浅。

证法,老子为代表小农阶级,后认为老子是唯心主义,则老子为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讲“明末及清代思想战线上斗争”,认为在哲学思想上,“唯物主义达到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高度,出现了王夫之那样的唯物主义体系。唯物主义者对宋以来的唯心主义理学进行了总结性批判。明、清统治者都把程、朱的唯心主义理学奉为正统思想,用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禁锢人民的思想意志,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下,要鼓舞起人民的反抗意志,不从思想上打破腐朽的唯心主义理学的控制是不成的。”①

由唯心与唯物、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以及进步与反动阶级对着讲,在“文化大革命”中便转换为“儒法斗争”,认为在中国哲学思想上,存在着对立的儒家与法家两大阵营。儒家代表反动的落后阶级,法家代表进步的变法的阶级。因而法家是唯物主义,讲辩证法的,儒家是唯心主义,讲“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文革”以后,各哲学史著作对“儒法斗争”作了批判。“四人帮用虚构的所谓儒法斗争史来代替各门历史学科的研究,对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所造成的混乱和破坏是严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通过中国历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思想发生、发展和互相斗争、互相影响的历史”②。实即回到“文革”前的两大阵营对着讲。在《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的侯外庐先生的《序》中说:“《评传》的作者们力求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既注意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上去考察历史事件和哲学思潮……《评传》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推陈出新的集体创作。”③这就是坚持哲学史的党性原则。

虽《朱熹思想研究》④,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然在 1983 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中,一杂志发表《评〈朱熹思想研究〉》的长文,批评该著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上产生了偏差,模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也模糊了“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这种观点与恩格斯当年批评过的施达克的观点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恩格斯曾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批评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既然《朱熹思想研究》与施达克“异曲同工”,又发生在恩格斯的著作之后,于是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学风、道德、名誉,更关系到人民的利益。恩格斯告诉我们:‘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的东西比最好的稍差一点,那就是犯罪’”。其实,《朱熹思想研究》是用“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把解剖刀,来整理中国哲学史古籍,剖析哲学思想体系,寻求哲学思想发展规律”⑤。在该书的第五章《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中的第一句话,朱熹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大的客观唯心主义者”。并在该章第六节专门写了《理论思维的经验和教训》:(一)“把人们认识的某一个方面片面发展为脱离了物质,必然倒向唯心主义”;(二)“寻求物质世界的开端和终极,是走向唯心主义的一条途径”;(三)“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必然陷入唯心主义”⑥。这种情况,仍然遭到无中生有、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人身攻击式的批判,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而,无论是撰中国哲学史还是外国哲学史都以唯心与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着讲。“任何一个哲学家、哲学学派都离不开物质和意识何者是世界的本源、本质,以及世界是否能被认识两个方面,对于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也就是对于世界的本源、本质是物质还是意识的不同回答,形成

① 参见任继愈编:《中国哲学史》第 4 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9-10 页。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编写说明第 1 页。
③ 辛冠洁等主编:《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济南:齐鲁书社出版社 1980 年版,序第 1—4 页。
④ 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⑤ 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前言第 1 页。
⑥ 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91、294、297 页。

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对立的哲学派别”①。在《日本哲学史教程》的《绪论》中认为:“纵观日本哲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它遵循下述哲学史的共同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生产状况决定哲学的发展,在阶级社会中哲学受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制约,从而带有明显的党派性。”②哲学史的党派性即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大阵营的对立。对着讲是历史特定阶段特定的理论思维形态。

四、自己讲

“回头自爱晴岚好,却立滩头数乱峰。”然“风来云散空宁碧”,改革开放又一春。中国哲学自觉醒,乾坤造化照自心。在信息智能的新时代,中国哲学应有新气象、新思维、新理论、新生面,因而必须转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为自己讲、讲自己。“自己讲”是中国的哲学毅然排除一切干扰和执着,卓然独立、自作主宰地自己讲。它是中国的哲学主体挺立于世界哲学之林的开显,它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人类精神爱智反思的反思哲学思维主体,是讲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精华妙凝和合的主体。“讲自己”是指中国的哲学自己讲自己的哲学所谓的哲学,中国的哲学家以自己的哲学为哲学的哲学家。它是中国的哲学自己讲述自己对时代精神核心话题的体贴,讲述中国的哲学自己对“话题本身的重新发现和自己对每个时代所面临的冲突和危机的艺术化解,讲述中国的哲学自己对安心立命、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的至诚追求”③。

“自己讲、讲自己”是中国的哲学理论思维形态转生和创新的前提和基础。中国的哲学每一次转生和创新的特征、性质、内因、外缘,都具有内在的逻辑必然之则,或曰中国的哲学转生、创新的标志:一是核心话题的转向。思想是时代精神的言说机制,哲学作为以思想的思想而反思的思想,亦是人类精神思想的反思。大凡作为时代精神的意义追寻和价值创造,化解时代面临错综复杂的冲突和危机,梳理盘根错节的生命情结,建构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二是诠释文本的转换。文本是哲学思想言说的符号踪迹,是智慧觉解的文字报告,是主体精神度越自我的信息桥梁。每个时代的哲学家必须凭借对一定文本的探赜、研究、体贴和诠释,以提炼体现时代精神的核心话题,使其全面融入民族精神和生命智慧,是哲学学派创立的文献标志。三是人文语境的转移。它是一定时代的自然生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理论思维、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可能世界的思议环境。这三条是中国的哲学之所以能够理论思维创新和转生的本真彰显④。

在尽究体贴中国哲学理论思维转生创新每一时期内在逻辑三规则标志之后,自己讲、讲自己中国的哲学,必须度越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根据三千多余年来中国的哲学发展实际,自下定义:中国的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⑤。所谓道的道的体贴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反省、反思、体悟、体验其导向、倾向、指向某一现在、未来的道路;是然之所以然的形上根据;然之所必然的理势。“名字”的名是指模拟事物实相的称谓,是人对于体知对象的性质、内涵的判断词,相当于现代所说的概念、范畴;“字”根据许慎的《说文解字》,即解释文字的意义。“名字体系”是指抽象概念、范畴的意义的诠释所构成的理论思维逻辑体系。唯有依据中国的哲学本真,自下定义,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才能确立中国的哲学,而非哲学在中国;才能在世界哲学之林中获得自己独立的、应有的地位、价值和话语权。

改革开放 40 年,世界已进入信息智能时代,随着哲学人文话语语境的更替变化,中国的哲学也应与时偕行,唯变所适。其核心话题应转现代

---

① 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 页。

② 王守华、卞崇道:《日本哲学史教程·绪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7 页。

③ 参见张立文:《自己讲、讲自己——中国哲学的重建与传统现代的度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④ 参见张立文:《和合哲学论》,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37 页。

⑤ 见彭永捷:《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序第 7 页。

新儒家的理气心性之学为和合学,其诠释文本亦转现代新儒家的“四书”为《国语》为主,辅以《管子》《墨子》。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和合学是指研究在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存在的和合存在,并以和合的义理为依归,以及既涵摄又超越冲突、融合的学说①。

和合学是针对当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冲突所造成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冲突所带来的社会人文危机(动乱、战争、恐怖等)、人机(机器人)危机;人与人的冲突而构成的道德危机、公私危机;人的心灵冲突而产生精神危机、信仰危机;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存有价值危机等。和合学是这五大冲突和各种危机的化解之道,因而和合学提供五大化解原理:和生原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万物都是生命体,应共同发育、成长而不互相杀害;和处原理。“君子和而不同”,世界上各种、各类多样差分,差分而有矛盾,甚至冲突,但应共同维护和谐、和合,和平相处;和立原理。“己欲立而立人”,自己独立、成功立业了,要帮助他者共同独立、成功立业;和达原理。“己欲达而达人”,自己通达、发达,要支持、帮助他者共同通达、发达;和爱原理。泛爱众,兼相爱。唯有爱,才是共生、共处、共立、共达的基础和保障,是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和合学的时代价值开显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基。

和合学理论思维体系构建,中国哲学创新三规则的发现,增强了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的信心和自觉。于是有可能重新思议中国哲学之所以成思潮及潮起潮落的内外因缘,各哲学思潮之间连接传承的规律性,各哲学思潮核心话题、诠释文本、人文语境为什么和怎么样变化,各哲学思潮如何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思潮未来走向,以及中国哲学在当代的理论思维形态,等等。这就不能照着西方哲学之谓哲学讲,也不能接着宋明理学讲,而只能依据中国哲学自己的特性、品格、神韵、方法的实际,自己讲自己的中国的哲学。这是古希腊“认识你自己”的逻辑延伸。“认识你自己”就得直面中国哲学思潮生命智慧的“本来面目”。中国哲学思潮的研议对象是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思潮,一个时代之所以思而成潮,必有一个凝聚这个时代思潮的哲学核心话题,才能成为那个时代哲学家所共同思议和论辩的话题,无共同思议和论辩的哲学核心话题,就不能蔚为思潮。尽管那个时代的各个哲学家对时代核心话题的理解、体贴各异其趣,而呈现为多样的风采、丰富的内涵、多元的结构、百家争鸣的格局,但各哲学家自觉不自觉地为时代哲学思潮的核心话题所吸引,而参与其思议和论辩,不离其时代哲学思潮核心话题的左右。

一个时代哲学思潮核心话题的转生,既是哲学内在理论思维逻辑演化的理势,亦是那个时代所面临冲突危机的回答,于是新的哲学思潮应顺而生,而开出新思潮、新生面、新气象。“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天地万物都在流变之中,哲学在流变,中国哲学思潮为道屡迁地在流变。先秦围绕思议“道德之意”话题,其标的是制止春秋无义战,追求一个没有杀人、战争的和平、安定、统一的生存世界;两汉围绕思议“天人相应”话题,其宗旨是追究人之所以生存的根源、根据,回应人为什么生存的天人感应及其相互制约的问题;魏晋围绕思议“有无之辩”话题,其要旨是在人的生命朝不保夕的情境下,回应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有何意义、以什么形式实现人生价值、能否实现人生价值问题;隋唐围绕思议“性情之原”话题,其目标是人从何来、死到何处去的灵魂安顿、终极的关切问题;宋元明清围绕思议“理气心性”话题,其宗旨是构建人格理想的超凡入圣,社会价值理想的万世开太平的安身立命、精神家园问题;当前信息智能时代围绕思议人类所共同面临的自然与生态、社会与人文、人际与道德、心灵与精神、文明与价值、人与人工智能的冲突和危机的情境下,如何化解、怎样化解,其标的是构建一个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自由、

① 参见张立文:《和合学概论——21 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和合学——21 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8、71 页。

平等、公正、幸福、快乐的天和天乐、地和地乐、人和人乐的天地人共和乐的和合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和可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天下。

为此我在《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引论》《新人学导论》和《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基础上,构建了《和合学》《和合哲学论》等,并以和合学的哲学理论思维梳理各个时期的哲学思潮,并依据中国的哲学实际的话题故事,撰写了从先秦到近现代的中国第一部《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①,企图将中国的哲学思潮系统化、完整化、概念化、逻辑化地显现出来,彰显中国的哲学的性质、特色、气质、风采、品格和神韵,使其光辉的品德在世界哲学之林中独树一帜。

Adaptation to Change:A Review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Past Century

Zhang Liwen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One hundred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Xie Wuliang's (谢无量)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中国哲学史》) and Hu Shi's (胡适) *A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中国哲学史大纲》). In the past century,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has gone through the stages of speaking about Chinese philosophy in accordance with Western philosophy (照着讲), speaking about Chinese philosophy in accordance with Neo-Confucianism (按着讲), speaking about materialism against idealism (对着讲), speaking about Chinese philosophy on our own theories (自己讲), and speaking about our own theori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讲自己). From the start of the 20th century to the early 1930s, it was the period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with Western philosophical terminology in China", in which Chinese scholars had to imitate Western philosophers, that is to say, they spoke about Chinese philosophy by selecting some traditional Chinese theories that could be defined in the terminology of Western philosophy. However, these scholars were the first to write dow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making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some Chinese intellectuals, who believed that "everyone has a share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ate of their country", spoke about Chinese philosophy in accordance with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朱熹理体学) and Wang Yangming's mind theory (王阳明心体学). They criticized the Japanese militarist aggressors for betraying the fundamental spirit and moral norm of Neo-Confucianism, and dealt a heavy blow to the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and cultural aggression of Japanese militarism. From the 1940s to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ese philosophers went through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labelled philosophy as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materialism and idealism, and between dialectics and metaphysics, and fell into the quagmire of "the war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During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ese philosophers began to speak about Chinese philosophy on their own theories, and about their own theori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ey pointed out the unique position, role and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realm of philosophy in the world. They also spoke about the conflict and crisis the humankind was confronted with concerning natural ecology, social humanities, interpersonal morality, mind and spirit, and civilization value. Chinese philosophers have done their utmost in constructing the theory of harmony(和合学), which contains such principles as harmonious living (和生), harmonious existence (和处), harmonious establishment (和立), harmonious accomplishment(和达) and harmonious love (和爱). The theory of harmony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featuring peace,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and win-win outcomes.

Key words: speak about Chinese philosophy in accordance with Western philosophy (照着讲), speak about Chinese philosophy in accordance with Neo-Confucianism (按着讲), speak about materialism against idealism (对着讲), speak about Chinese philosophy on our own theories (自己讲), theory of harmony

(责任编辑　　刘曙光)

①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另可参见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哲学史新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